

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梁啟超本人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論，他在這裏所表述的則是一種獨立的、批判的、開創新世界的精神。這倒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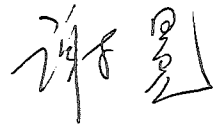
我們應該有獨立的、批判的創造精神，以開創我們二十一世紀的新文化。

丁守和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中國現代文化學會會長

多元秩序與文化整合



在急促而多變的二十世紀，我們居然能夠保持一個完整而近於封固的文化大陸；當友鄰的古老文明相繼黯淡以至消失的時候，我們竟能安然度過歷史的裁奪而存活至今，這個大一統的文化生命力之頑健實在驚人。中國百年來的衰危有眾多的原因，但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始終是近代以來先進知識界關注的題目。

大一統文化對一切「闖入者」有強大的融解力。它因長期缺乏競爭對手而顯得自足，於是造就它封閉、保守、自大、以及缺少彈性的品格。這一古老文化長久而全面的籠罩，構成民族心理的整體疲憊感。我們有過衝出自足心態的汲取，也有兩種文化碰撞所產生的激動，但終於又在其次無比的浸漫中消解。這原是一個浩瀚而充滿活力的內陸海，如今卻更像是一片望不到邊的沼澤地。

曾有幾代的盜火者，盜取了外來文明的火種，但似乎未經點燃便為無邊的暗黑所吞噬。反視這一百年，我們彷彿是希臘神話中那個受懲罰的人：他竭盡全力推石上山，然後那石又滾下來，他再推，又再滾回原地。在這個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想起本世紀第一個年頭梁啟超在〈過渡時代論〉一文中對中國所懷有的希望：「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於中流，即

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令人驚悚一百年即將過去，而中國這隻船仍然如梁啟超當日所看到的在「兩頭不到岸的海中打旋」。

打旋就是畫圈。當中國在不斷畫圈的時候，世界正沿着一條線向前走去，它用驚奇的目光看着這條龍演出一幕又一幕如同「文革」那樣自戕的活劇。我們總是期待一種新質的引進與加入，但是大一統文化的吞噬力總是能够把那歸化為舊質。思想和文學中的憂患意識與悲涼感由此而生。那麼，難道我們只能永遠受罰，永遠充當世界的棄兒或準棄兒，我們將何以自救？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似乎疑慮重重、憂憤更深。

中國傳統文化不能等同於罪惡。它的燦爛輝煌雖不宜永遠陶醉式膜拜卻有待積極的擇取與承傳。改造舊有文化使之適應現時的潮流以應國人的進步要求，也仍然是當今知識界的要務。國門的重閉是難以想像的。門既不關，就有風不斷吹來。這局面也許與本世紀的任何時期均有不同。然而，為進步計，我們仍要冷靜省思我們的文化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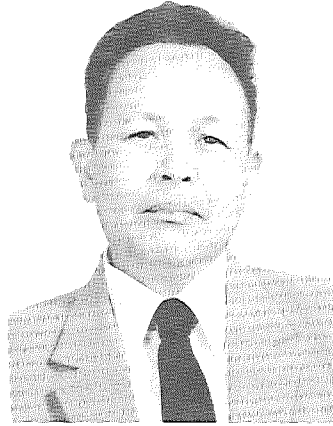
大一統的文化所具有的廣袤的覆蓋面與強大的凝聚力，曾造成中國若干朝代的繁榮，但由此派生而出的全民族的戀舊心態與缺少自新的創造精神則是事實。我們總是以沾沾自喜的口吻講述中國的四大發明，我們為甚麼不反躬自問：發明了四大發明的後代為甚麼會以落後者的形象出現在世界？

大凡容許多種文化存在、參與競爭的時代，總是充滿活力的時代。異質的加入提供了另一種參照系統，並能生發改造的動力以健全自身。遠的如盛唐，近的如清初，再近的如五四，都是多元文化的並存競爭促進社會進步的先例。馬克思主義也是外來文化，它的進入也曾激發過社會的生機。從文化生態的角度考察，多一種或數種的參照無疑會因差異和矛盾而激活思維，導致民族精神的富有。要是此論可以成立，則對於多元文化秩序的期待便具有合理性。

百年來的國勢艱危，造就現今不統一的政治地圖。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人為割裂是民族的悲劇。所幸在那些地域如台灣、香港、澳門的文化也都在各自的人文環境中發展。這種共時空的各有特色的發展，無疑提供了一種機緣。

國際化的商業、金融中心的香港，能够為我們提供在國際性的環境中中國文化如何適應世界現代潮流、及其與西方文化和平相處並吸收其有益養分的經驗。中國文化在台灣的發展體現了中原文化向着海洋延伸造出的更為瀟灑靈動的特點，那裏的環境有充足的條件可以促進中國與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匯。中國大陸是本土文化的母體，它的沉鬱渾厚、它在通往現代化進程中的艱難步履，以及在重建大一統所受的挫折，都是統一的中國文化在不同地區的獨特體現。

我們若是把意識形態的歧異暫置一旁，把這些由政治地圖分置的文化現象



加以歸納，我們眼前便出現一個大中國文化的總體形象。這種歸納不僅是超意識形態的，而且是具有巨大包容性的。我們把彼此的缺陷互補為共同的文化優長，這就是一個統一文化之內多元並存的駁雜與繁富，恰好應驗了我們久遠的文化加入與改造的期待。

一方面，我們繼續把目光投入黃土地邊界以外，讓那些薰風浸潤我們刀削一般的乾渴的高原與沙漠。一方面，我們反顧自身，承認此種多元秩序的合理，不是如同往常地把它重新整一，而是在一個文化母體之內滲透若干新質和異質，借以潤滑我們的腸胃，讓我們在自身體內開始新陳代謝的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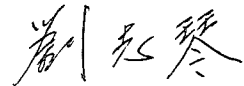
也許我們會結束那衝突又沉寂、開啟又閉合、始終畫着那阿Q式的圓圈的悲劇。二十一世紀對中國人來說仍然是悲涼的，它只是一個未知數。

謝冕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

文化研究應輕裝前進



二十世紀80年代的中國是以歷史的新時期而著稱於世界。在這一時期，中國出現引人注目的持續的文化熱，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論、文化建設與一系列重大文化課題的研究性熱潮。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深入各門學科，成為理論界、文藝界、科學界、教育界、新聞界共同研討的課題。高等學府、民間社團、科研機構以研究文化為熱點，企業、城鎮、校園、街道以關注文化為時尚，其參加人數之眾、討論議題之多、發表論著之豐，為1949年以來所未有。

80年代的文化熱，使人們很自然地想到五四前後的文化熱，兩次文化熱相距六、七十年，幾乎間隔兩代人，而課題又那麼相近、相似、重疊、交錯，論題中的意向還可追溯到鴉片戰爭後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先驅們的思慮。這一百多年來文化研究的進程表明，現代化尚未完成，有些問題甚或徘徊百年未能尋到答案。然而這又不是簡單的重複和延伸，百多年來的中國歷經滄桑，社會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變化使80年代的文化研究成果，無論從數量上還